

权德輿策问思想
内容研究



陈江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权

德

輿

策

问

非外借

权德與策问思想 内容研究



陈江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研究 / 陈江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203-4182-0

I. ①权… II. ①陈… III. ①权德舆 (759-818) -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2. 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82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伏俊琰

本书是陈江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08年，在“5·12”大地震中受了轻伤的陈江英来到西北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我和秦丙坤副教授是她的指导教师。此前在大学读其他专业的时候，她就喜欢中国古代文学，曾旁听过我和其他老师给本科生讲授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她勤奋踏实，细心而又执着，遇到不懂的问题，反复查阅工具书，不弄懂不罢休。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以权德舆策问为选题范围。“策问”是古代的考试题，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反映的是那个时期的社会热点、价值观念和知识追求。由于时过境迁，当代人读起来，云里雾里，很是隔膜。因而，古代的策问，研究教育史的学者涉及多一些，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关注不多。所以，我最初对她选择以权德舆策问作为研究对象，感觉很没有把握。好在我的老师、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的霍旭东先生刚刚整理出版了《权德舆文集》《权德舆诗集》，霍老师就在身边，可以随便打扰叩问。在最初读权德舆策问的过程中，陈江英确实遇到诸多硬骨头，可以说到处是技经肯綮，不小心就尝到大辄，但她没有气馁，坚持了下去。硕士毕业后，她仍然没有放弃权德舆策问这个大骨头的硬啃，经过七八年的修改补充，这本20万字的专著终于要出版了，我是由衷的高兴。

客主问答的形式，是中国文章的源头。现存最早的文章，几乎都是对问的形式，从《尚书》诸篇，先秦诸子，《国语》《国策》，黄帝《内经》等，大都运用对问的形式，《诗经》《楚辞》中对歌也不少，而汉赋更是“客主首引”。汉兴，高祖刘邦本来鄙视文学，而纵横家出身的陆贾因势利导，顺着高祖的意思发问，借机陈述秦亡汉兴之理，刘邦“怦然汗出，霍然病已”，群臣三呼万岁。终西汉一代，“秦所以亡，汉

所以兴”成为政论文的永久主题。博学审问的汉文帝，以策问的形式向晁错询问治国之策，而《汉书·晁错传》载有文帝策问的诏书和晁错的对策。文帝的策问不仅发“问”，而且讲历史，讲背景，自陈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心情，逼得大臣不得不披肝沥胆，“悉陈其志，毋有所隐”。策问本身也是很有技巧的短文章。晁错的策论更是洋洋洒洒，斩钉截铁，峭直深刻，是短小精悍的政论文。文帝的策问和晁错的对策对隋唐以来我国科举考试影响很大。吴承学先生在他的名著《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说：“试策是中国古代历时最长，地位最稳固的考试文体，大致可以说，历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都离不开对策。”

权德舆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十九年（803）、二十一年（805）三掌贡举，撰写了五十道策问。这些策问，以《尚书》《诗经》《周易》《春秋》《论语》《庄子》《文子》等为命题之根据，主要借对经典要义的阐释，来考查考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并结合经典分析当时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以求得解决的办法。这些策问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文化、士风的深刻思考，文笔也简洁明快，是他议论文中的精华，是体现他的经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集中而有代表性的篇章。

权德舆策问，还应当从经学发展史的角度理解。我们知道，汉魏六朝以来，一方面儒学式微，另一方面则派别林立，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加之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互相攻诘，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专制政权在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需要，便有了整顿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举措。唐太宗时孔颖达受诏领衔撰修《五经正义》，正是文化统一的产物。《五经正义》完成后，唐太宗给予很高评价，从为“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但此书在当时，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曲徇注文”，“杂引讖纬”，问题多多。而自由开放的唐代，枯燥陈腐的经学，并不为时人所看重。所以，初唐、盛唐，经学总体上是处于衰落状态。到了中唐，便有一些儒者，像韩愈等就痛感儒学“道统”的衰落，要“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权德舆的策问，可以说与韩愈振兴儒学道统的呐喊相呼应。略晚于权德舆的杨倞注《荀子》，就是因为他认为孟子和荀子都是孔子之后的大儒，但《孟子》一书传

习不绝，历代都有人为之作注。而《荀子》一书却备受冷落，其书虽存而传习者寡，致使编简烂脱，传习谬误，文义不通处，比比皆是。于是发愤整理《荀子》，调整篇次，为之训诂，使全书合乎儒学的基本思想，也是振兴儒学的重要举措。

正是从经学思想史的角度，《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研究》选取了权德舆五十道策问中四十三则，一方面对其内容进行语义学层面的疏证，另一方面结合权德舆所处的时代背景，揣测其策问的意图，归纳分析其策问体现出的为政、为人、为文的思想渊源，对权德舆策问中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归纳分类和意义阐释。本书的学术价值正体现在这些方面，尤其是对策问内容进行疏证，需要对经典下很大的功夫。这在古人来说，由于他们从小熟读经典，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对现代学者来说，就是需要有耐心，一条一条的查寻。虽然计算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对经典的解读还得靠自己结合上下文慢慢体会。所以，本书的疏证还存在一些不确切的地方，作者又一时解决不了，读者如果能够补充纠正一些，那自然是作者高兴的事。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对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糟粕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策问、权德舆的策问也存在诸多陈腐的东西，研究者的责任还应当揭示并批判这些糟粕。权德舆试图用儒家的思想改造世道人心，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历史证明也是没有成效的。近年来，“国学热”势头很猛。当然，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得到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长。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由以前的基本否定回归到正常位置，这是一种文化心理学上的回归，是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的自发传承，是没有问题的。但社会上往往是鱼龙混杂，甚至出现许多天方夜谭的事情：有人说通过让孩子读《弟子规》，可以治疗孩子的急躁症，减轻孩子的青春叛逆；读《弟子规》以治疗网瘾，读《孝经》《女诫》以改善婆媳关系，治妇科病。甚至一些地方把“二十四孝图”刻画在公共场所，让人们去学习效法。而一些“国学教师”，没有多少国学功底，只是趁着国学流行这股大势摇身变成“大师”。这些人中，有大讲风水八卦的，有练瑜伽的，有涂鸦丑书怪书的，有弹古琴的，还有研究怎样才能得道成仙的。这是传统文化复兴中的一股逆流，国学研究工作者应当高度警惕并批判之，引导国学回到

正轨之上。

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价值也不能估计太高。过去有学者讲，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儒家文化要拯救世界等等，这类说法，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文化无法催生现在科学，也不能挽救百年前中国的贫弱，现在也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信仰问题。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拨开掩盖在它上面的沉沙，还历史以更为真实的面目，认识和感受我们祖先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总会对自己的童年和过去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一个民族也一样，通过对自己过去历史的回顾和优秀文化品德的总结，使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精神领域，能与古代圣贤鸿儒相交接，可以开拓心智，培养责任感和道德品德。而不是回到古代，穿上所谓“汉服”，行跪拜之礼，这是戏剧工作者要做的事。

更重要的，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一要有科学精神，二要有世界眼光。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按照公理建立起逻辑体系，将零碎的、片断的、不系统的知识整理归结成一个标准化的系统。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更多地关注内在自我，修身养性，人伦关怀，而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总体上缺乏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先秦的法家、名家、墨家包含有朴素的科学精神，但这几家大约在汉代就基本式微了。缺乏科学精神，极容易把零碎的、片断的、不系统的知识“玄学”化，而不去追求探索其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医学是最接近科学的学科，中国早期医学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只是老老实实在地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手术治疗的位置等。但中医发展到后世，则越来越神秘，越来越玄妙，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春秋四时，天人合一，万物系联，反而把早期治病的绝招丢了。从汉到清，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没有多少增加，就是证明。清代大诗人、大学者袁枚曾针对当时的医学风气说：“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传而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现在电视广播微信上讲中医养生者比比皆是，而能治病的名医却少之又少；治病者难，而谈玄者易也。

所谓世界眼光，就是要把研究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央提出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认识，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在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融中体现其价值，体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人类文明有其共同性，文化价值有其普世性。像中国传统契约文化中体现出来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守信精神、救济精神等，都应当是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族群普遍认可的。全世界人民有了诸多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12月24日

序 二

秦丙坤

权德舆（759—818）是唐代贞元、元和间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今存诗 397 首，存文 428 篇。在贞元十八年（802）、十九年（803）、二十一年（805），权德舆三掌贡举，故《全唐文》存权德舆策问五十道，这是中国古代科举文献中十分珍贵的史料。权德舆五十道策问的价值，一方面作为唐代科举及儒学教育最原始的材料，反映了中唐贡选的基本思想标准；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观念、经学观念、文学观念及时代历史背景。同时，唐中期的重要历史局面和政治问题，也从策问中曲折地反映出来。所以，权德舆策问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20 世纪末以来，学界对权德舆诗文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先后有霍旭东先生和郭广伟先生对权德舆诗文集进行点校整理。对权德舆的相关研究基本集中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相对而言仍不够充分。到目前为止，对权德舆策问的专题性系统研究，仅见陈江英的硕士学位论文《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论析》。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陈江英又以此为课题成功申报 2016 年甘肃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这是她取得的又一项成果。

对权德舆策问的研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在所见到的既有研究成果中，一般都不涉及德舆五十道策问，间有涉及者，也往往根据策问大意点到为止，引用若干策问文句作为分析所涉问题的参考性内容。或有甚者，在研究中刻意规避涉及策问材料。其原因在于，权德舆的策问本身为科举考试的试题，其中涉及大量儒家经典典故，许多典故通过点染间接出现，致使策问艰涩难懂，在今天看来，这是极其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对研究者的要求也非常高，第一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古文献功底和古文解读功夫，第二需要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相当程度的谙

熟，第三需要对先秦儒家经典全面系统的透悟，第四需要对唐代尤其是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具备较开阔的历史视野。此外，还需要研究者的学术执着精神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很难想象如何进行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攻城不怕坚，攻书不畏难”，陈江英通过自己的努力，刻苦钻研，以毅力克服阻力，遇到问题，直击肯綮，终于完成这一课题，非常令人赞佩。

陈江英的《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研究》，对权德舆策问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进行分类研究，从解读权德舆“策问”文本出发，结合权德舆所处的时代背景，考察权德舆出题的意图，对策问中的经学典故予以深入细致地发覆阐微，探究权德舆的儒学思想、文学观念、忧患意识、为政之道，揭示了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又结合策问内容，对中唐社会及政治局势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唐代的科举与策问”，梳理科举、策问、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研究”分上、下两章，是对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研究的核心部分，将明确以儒家经典命名的策问列为第二章，将道教典籍以及未明确以儒家经典命名的策问列为第三章；第四部分“权德舆策问的特点”，从文体特点和写作特点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第五部分“权德舆策问的价值”，从权德舆策问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史料价值、现实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恰当评析。

全书对权德舆策问思想内容的探讨非常深入细致和全面系统，运用资料丰富翔实，论证过程恰如其分，逻辑严密，结论较为稳妥，充分体现了述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尤其对每道策问的解读阐释，一般通过整体引用文献、总结主题、发覆策问中的儒家经典及典故、释读策问大意内容、分析策问思想及中唐社会现实局势等环节，将策问中的难解之处进行全面清扫，使策问成为易读文献，并在进一步的深层探析中尽显功力。这一工作虽然朴实无华，但对作者的要求甚高，其学术分量之重，在认真阅读本书后自然能够体会到。本书的创见非常明显，因为权德舆策问研究这一课题本身就是开创性的。本书对权德舆策问弃传求经、质疑经典、树立儒学新风等方面的论证，首次揭示了在中唐儒学变革的背景下，权德舆作为元和学术群体的先辈，具有引领当时儒学思潮的作

用。作者对权德輿策问的文体特点、写作特点及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史料价值、现实意义等方面的阐述，也具有新创之功。

陈江英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备受艰辛，作为她的硕士生导师，我主要做宏观指导，在遇到难题和写作困境时，给她提供一些研究思路，在解读策问中的儒学经典等方面也有所帮助。作为合作导师，伏俊琰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给以极大帮助，伏先生也是我攻读硕士阶段的导师，恩师之惠，永远铭记在心。我们还经常请教《权德輿诗集》《权德輿文集》的校点整理者霍旭东先生，霍先生总是给以耐心的帮助指导。成果的完成，更多的是陈江英自己的发奋努力，在学术研究的路途中，每走一步都需要脚踩大地。希望陈江英通过勤奋扎实的努力，有更多更好的后续成果问世。略陈己见，谨以为序。

2018年12月于西北师范大学

序 三

蒲向明

“文脉”为龙脉之一种，系负辰之魂，属文曲昌兴之象，曰为山、川之势，则有文、武之别。伏羲魂化九龙、真身游历天下，所遗百峰，皆为龙（文）脉。遗世便有汉、唐，文风鸿燊，名家辈出，诗文作品犹如明珠璀璨，遗落后世。如司马迁史家绝唱、贾谊过秦之论、枚乘《七发》、相如《子虚》《上林》、赵壹《刺世嫉邪》、汉乐府、文人五言诗，唐李杜诗、韩柳文、新乐府运动、传奇变文、参军戏……真正不胜枚举。可见，伏羲遗世文脉在汉唐，并非虚妄。就地域而言，伏羲留文脉，首善在成纪、略阳。《帝王世纪》说：“（太皞）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因而汉、唐成纪文脉群星闪耀：纪信、李广、李陵、隗嚣、李渊、李世民、李白、李隆基、权德舆、李昭道、李翱……故汉唐陇西成纪、天水略阳，以文华显于后世，有伏羲遗脉的优势。神话传说或失于无稽，但20世纪大地湾考古发现，属于科学力证，远古先民化文于此，流芳后世，似应不争。

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其族自秦初至唐天宝末，世居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韩愈在给他盖棺论定撰《唐故相权公墓碑》（《韩昌黎集》卷三十）时，以为追溯权载之族源不能过远，就汲取载之自撰《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一文说法：“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权。权，江汉间国（在今湖北当阳）也。周衰，入楚为权氏。楚灭徙秦，而居天水略阳。”查载之原文，权氏一族北迁属于“楚灭秦迁，始居汧陇。”这里的“汧陇”《旧唐书》本传理解为“天水略阳”，而《新唐书·卓行·权皋传》（权皋为载之父）解释为“秦州略阳”，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者兼而用之。可见，权氏自秦以来世居天水略阳。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总括权载之传记、陈述著录情况称：

权三德舆，字载之，旧（唐书）一四八、新（唐书）一六五有传，全（唐）文六一八李直方《祭权少监文》、九一七清昼（皎然）《答权从事德舆书》记述甚详。王红霞的《权德舆研究》论云：“权德舆先世为历代仕宦，至皋虽名位不显，但名节冠于古今，还是颇有影响的。”“权德舆先世以儒业传家，以德行、政事、文章显世……家族内学术气氛亦很浓厚，家风也很纯正，这些都对权德舆的成长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所述甚为中肯。不错，权载之生长之根本在秦地汧陇，于此已明就里，而且世业续传，家风熏陶，学术滋润，都毫无疑问。

但是，权载之的生地毕竟不在秦域汧陇，生地润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给他成长的影响，当然最为直接，而且不应回避。据《新唐书·权皋传》：载之父权皋，第进士。由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上表为幕府，后来他发觉禄山要反叛，欲私下离去，但考虑会祸及亲属，就等待机会。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派他献俘京师，中途他诈死，奉母潜往江南，这个义举给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载之父皋避乱，自天水略阳奉母移家，到润州丹阳县（今江苏省镇江）居住，这时权载之还没有出世。因此，权载之祖脉天水略阳，而他的生地是在丹阳。这个“江山清绝，襟吴带楚”之地，使他耳濡目染楚骚文学、齐梁诗风，不仅博大了他的学养和胸怀，而且就其文学成就来看，权载之文化品格的建立，与其祖籍家乡秦地汧陇、生地润州丹阳的地域文化和谐交织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秦地世业与家风给他刚毅、执着、勤勉的品性，楚骚文化滋养出他文化气质的温婉多情，而齐梁文风熏陶到他行文炼句的言语华丽、辞藻巧工乃至精细音律。所以权载之的文学与文化内蕴，系南北文化大系养育，独特与唯一在其自身，不可复制。

比较而言，权载之的历史声望先属于中唐政治家，而后才是文学家。他一生历唐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二十二岁从“杜佑任江淮水陆运使，辟公为从事”起，步入仕途，离开丹阳至扬州“署朝职为试右金吾卫兵曹参军”（蒋寅《权德舆年谱略稿》1994）起，二十七岁“奉母赴江西任观察使判官，朝衔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其后十年仕途不遂，以散官云闲居多。三十七岁改尚书省驾部员外郎，仍知制诰，散官迁宣德郎，勋官为云骑尉。三十九岁仍驾部员外郎任，充进士试策官作《贞元十三年中书试进士策问两道》。四十岁任职生涯

风生水起，“迁尚书司勋郎中，兼知制诰，散官为朝议郎，赐绯鱼袋，勋官如故”，真正步入朝堂。不久擢中书舍人，四十四岁以职知贡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及第。不久拜礼部侍郎正四品，凡三岁掌贡士。四十七岁以礼部侍郎撰德宗谥册文，遂文名，旋转户部侍郎，迁朝散大夫。四十八岁转兵部侍郎，勋官迁骁骑尉，四十九岁改太子宾客，五十岁复任兵部侍郎，散官迁太中大夫，勋官迁上柱国，爵封襄武县开国侯。五十一岁迁太常卿，赐紫金鱼袋，散官迁通议大夫。五十二岁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十三岁任宰相，权知门下省过官，达到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后罢相，官职升降，颇有轮替。六十岁以山南西道节度使，病乞还，归至洋州白草薨。他一生的政治贡献，主要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德治和法治并用，对贪官污吏坚决严惩，相对平民的疾苦则倍加关注。他以实用而俗化的生存态度，试图重振王朝权威、恢复儒学礼教秩序，并以此显现元和中兴赖以成功的思想、制度、经济、文化和人才基础（严国荣《权德舆研究》2004）。由之，则不失君上肱股、朝廷栋梁。因此，不仅在当世影响很大，在为事、为政时方面誉为“一代宗匠”，杨嗣复、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等都先后出其门下，其所擢进士中有七人后官至宰相，而且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精英，为中唐网罗人才、奖励贤俊贡献非常，颇受时人的仰慕与推崇，后世余响不绝，褒称“文坛宗师”。

权载之作为文学家的意义，似乎被他重大的政治成就与声望所遮蔽。《辞海》甚至不立条目，现今诸多《中国文学史》提及权德舆者鲜有。如广有影响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196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1997）和袁行霈《中国文学史》（2004）等均未提及权德舆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1962）仅在论及刘长卿诗歌时说：“刘长卿的诗内容丰富，各体都有佳作。权德舆称他为‘五言长城’，主要是指他的五言律诗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二）》1962）刘长卿诗有“五言长城”之称，竟然出自权德舆。可其他文学史提到“五言长城”，多称刘长卿自诩，因而形成一段公案。说权德舆有此称，其实由来已久。《新唐书·秦系传》：“（系）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亦壮。”《唐才子传》说

“权德舆称（其）为‘五言长城’”，《全唐诗》亦称“权德舆尝谓（其）为‘五言长城’”。查《权载之文集》《四部丛刊初编》补遗《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云：“彼汉东守（按：长卿曾任随州刺史，故称）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秦系）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珮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显然，《新唐书》是直接采用了权序之说，而《唐才子传》《全唐诗》对此有所演绎。

可以肯定的是，权德舆最早记载了“五言长城”之说，是毫无疑问的。这里的权德舆仅以一个诗论家的身份被指出来，虽然见地卓尔，但没有进一步的敷陈，具体的细节就永远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比较而言，只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论说盛唐、中晚唐诗歌的相互影响时，提到了权德舆诗歌的风格：

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大历以后，吾所深取，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此言是说，权德舆的诗歌创作风格“绝似盛唐”者，大体指那些词近情遥、语浅情深，含蕴丰富、既明朗又耐人寻味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多用白描，无论即事感遇抒情写景，无论古诗、近体，语言清丽、平淡，不事涂饰。笔墨省净，情韵耐人寻味。（林家英《论权德舆的为人、为文、为诗》1982）在中唐大历以来诗风趋于平庸的诗坛上，权诗显示了自己的个性特色，其清淡、自然的语言风格，为后人所称道。因创作特色相近韦应物和刘长卿，以致在大历诗人集团里面位居李贺、柳宗元、李益等诗家之列，并为著者所竭力取法，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具有的清淡、自然的语言所构成的恬静、闲远的意境方面。权诗对生存状态的汲汲关注，实用化、世俗化的人生态度，浓郁的生活气息、琐碎的生活细节描写等，包括他在赠内诗、咏史诗、游戏诗表现出的某些开

拓、丰富和深化，都是与其思变创新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的。权德舆还是我国古典美学重要范畴之一“意境”说的早期开拓者，他首次把“意”与“境”联体论述，使之组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完整意义表达，从而赋予“意境”完整、独立的范畴品格，且第一次完整表述出了意境的含义，为后人完善这一理论表述规定了合理的路径，此为他对意境说的大贡献。

蒋寅先生指出：“权德舆在中唐文学史上的意义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贞元到元和间，这位声望卓著的文学家，不仅以文坛盟主的地位提携了一批中唐文坛的中坚作家，同时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成为贞元诗坛的重要内容。”（《成长的烦恼——权德舆早期诗作的心态史意义》2004）这段论述，显然比钱基博所言又进了一步：一是明确肯定了权德舆在中唐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声望卓著的文学家，据文坛盟主的地位；二是他影响并提携了一批中唐文坛中坚；三是他的诗歌创作是贞元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近400首诗歌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唐诗宝库，奠定了他在中唐贞元、元和文坛上应有的地位。

较之文学通史，唐文学断代史述及权德舆诗歌和散文创作就更多一些。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1994）、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1995），但还是没把他作为重要作家予以观照。倒是日本学界在唐文学断代史中讨论权德舆在文学上的成就要多一些，如松本肇著《唐代文学の視点》（2006）、川合康三著《唐代文学——终南山的变容》（2013）他们把权德舆的诗文创作打通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并对其创作心路予以探讨，这个研究视角，无疑是国内学界在研究权德舆方面值得借鉴的。

权德舆出自祖德清明、家风雅正的仕宦家庭，具有秉政忠直、刚正不移的个性，其为人“外坦易而内谨重，雅正而自然，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茅国华等《论权德舆的人格风范与诗歌风格》2007）其诗似刘长卿、韦应物，含蓄温和、清雅洗练的风格，源于其个性和为人。这一点，同样映照到他的散文创作，十五岁就有文章百篇，中唐以文章著称，为台阁体重要作家。其文章雅正鸿博，气象宏阔，这一点似为他诗歌创作所未有。他的史论以《两汉辨亡论》最负盛名，后世史家以为“有补于世”。从写作分类上看，除史论外，权德舆集序、赠

序、碑铭、行状的写作占了很大比例，“公卿侯王碑铭、行状多出其手”（王伯恭《中国百科大辞典》“权德舆条”1999），但其文学成就，在著述议论、策问上的表现也可相比肩，甚或更高。

权德舆所作大量集序文，反映了大历、贞元时期的一些文学活动、创作风貌与理论观点，其中《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韦宾客宅宴集诗序》等作品，体现了儒家诗教观指导下的言志与缘情并重理念，既反映了唐代士人诗歌唱和的基本情况，也在理论上对唱和这一形式进行了探讨。（杜光熙《权德舆三篇唱和集序文的创作背景与诗学思想》2017）

在赠序文的演进历程中，权德舆的写作占有极为醒目的位置。权氏因长期辗转于幕府、台阁，为中朝风雅主持，遂成为第一位大量写作赠序的作家。他的创作表明，赠序写作首先与职务密切相关。其赠序在话语和文体两方面都显示出对文体功能的自觉和文章结构的成熟，标志着赠序的定型，从唐代散文史的角度考察有着多方面的意义。（蒋寅《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2010）如《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揭示心与境的关系，认为心是主，境是从，体现了佛教的文艺观。（张培锋《佛教美文集》2017）

议论文“尚气尚理，有简有通”，如《醉说》表述如何写好文章，认为“气”与“理”不可偏废，若一味鼓其气（气势），置“理”（内容合理）于不顾，内容粗浅或不尽合理，则将流为叫嚣鼓怒，也即说文之气势应服从于理，但若言理而不以气行之，则文章也会孱弱无力，不能动人。其为文理念明显受道家理论影响，在其为人与其所说确有一致方面，亦可见其吸收道家思想之自觉。（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先秦至唐五代卷）》2007）再如很有影响的《两汉辨亡论》，讨论两汉之亡，对保位持禄、尸位素餐的大臣极其不满，而对原始察终以追求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法可取，主张有关国之兴衰的大事，更应未雨绸缪，做长远的规划。（梅显懋《中国古代史论精华注评》2010）权德舆眼界宏阔，能突破一时一论之限去追溯史事时政，将汉代灭亡置于积久的历史因缘中考察，令人赞叹。可惜他把历史变革归罪于个别人物之上，亦不免表现出儒者的迂腐。（岳立松《拨开历史的迷雾：史论》2010）文章立论新颖，叙议结合，论述透彻，笔端饱含激情，写